读史札记

锡良在清末东北的教育改革考述

周　赫　乌云毕力格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日俄帝国主义在东北地区的角逐使东北地区出现了“殖民”教育危机，东北教育改革作为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举措，由封建性被迫走向半资本主义半封建，加之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东北封禁的打开，使得东北地区的教育逐渐呈现近代化的特点。随着东北三省建省及行政体制的变革，锡良在东北施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推动了东北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从而影响了东北近代教育的发展。

一、锡良在东北教育改革学术关注的缺失

锡良（1853—1917），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自同治十三年（1874）任山西知县起到宣统三年（1911）辞热河都统止，为官近 40 载。其间有四段任职经历与他所推行的清末新政教育实践有关。[①] 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东河总督之时竭力从外省引进人才，并在原开封游击署衙的基础上创建河南大学堂。光绪二十八年调任热河都统之后，在当地广设中小学堂及蒙养学堂。光绪二十九年擢闽浙总督，旋调署四川总督，年底实授，根据“癸卯学制”对四川教育行政机构进行改革，推行西式教育。[②] 通过这三次教育实践，锡良意识到培养民众改革思想与中西学制融合以及师资人才建设与选择教育对象的重要性，因此在宣统元年至三年任东三省总督期间，锡良依托其在河南、四川等地区的教育改革经验，参照新政教改内容，力图在教育上实行“中体西用”，对东三省内的教育体制进行整顿。

但是学术界对锡良在东北的教育改革问题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锡良维护云南等地的铁路利权，参与各省官制改革以及宪政运动等事迹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较之下，锡良在教育改革上的功绩被学者们所忽视。[③] 实际上在锡良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都没有出现与之相关的著述，21

[收稿日期]　2021-11-19
[作者简介]　周赫（1990—　），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872，he17890714@163. com；乌云毕力格（1963—　），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bilig63@126. com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 449，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2534-12535 页。

② 例如李绍先、陈渝：《锡良与近代四川教育》，《文史杂志》2004 年第 3 期；潘崇：《锡良与清末川边新政》，《民族研究》2018 年第 2 期。

③ 潘崇：《清末铁路建设与多方势力的路事博弈——基于锡良筹办川汉铁路的讨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潘崇：《锡良督东时期东北铁路规划始末》，《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连振斌：《锡良与安奉铁路交涉》，《兰台世界》2013 年第4期；高月：《锡良与锦瑷铁路计划：以主权维护为视角的考察》，《东北史地》2010 年第4期；

世纪以来，学者们才注意到锡良。《锡良与中国国民革命》（*Hsi-liang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与《锡良与清末新政研究》是目前研究锡良著作中最为重要且全面的两部。① 后者的作者连振斌应属国内研究锡良最为深入的学者，他的研究涉及锡良在河南、四川、热河、奉天所推行的教育措施，但他在研究锡良在东北的改革之时，更偏重于其修铁路与国会请愿运动等方面的政治分析，在概述锡良对奉天教育的改革之时仅用了很少的篇幅，缺少对锡良教育改革的评价。② 二是相较清末新政时期其他省份的教育改革，东北地区的教育改革施行时间晚，推行时间短，且现存文献稀缺，加之锡良督东期间并未编著相关政要或日记，③ 只有分布在《锡良遗稿：奏稿》《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等档案集中的奏稿、电稿、札牍以及杂档等文献，而这些文献皆为锡良后人或后世学者搜集整理，其中与东北教育改革相关的档案不足 50 件。④ 要还原锡良在东北的教育改革还需借助大量的东北史志文献，这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造成了困难。另外，学界一直将徐世昌在东三省进行的教育改革作为研究中心，间或提到奉天巡抚唐绍仪、吉林巡抚朱家宝、黑龙江巡抚程德全，而未涉及锡良与赵尔巽的教育改革。⑤ 且在归纳总结东北新政教育改革的内容时较为概括，缺少对档案的引用、解读以及具体案例分析等问题。

但若细究三省近代基础教育学堂的创设，则可追溯到 1906 年至 1911 年之间，且大部分学堂建立于锡良执政期间。锡良仅用不到 3 年的时间在三省内进行了全面的改革，铺设了东北近代教育体制的雏形，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推进了清末东北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唤醒了近代国民革命意识与精神。⑥ 锡良在东北实施的教育改革是我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重要的举措。

二、锡良在东北的教育改革举措

东北新政教育改革始于 1907 年，时逢徐世昌上任，他遵循“癸卯学制”要求，上《拟定东三省职司官制及督抚办事要纲折》，实行自上而下的新式教育体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东北近代教育的行政机构。⑦ 在他执政期间共建学堂 2400 余所，其中 2113 所集中在奉天。⑧1909 年，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考察教育情形，指出：“奉省开通较早，规模渐备，程度尚优；吉、江虽文化较迟，进步亦速，且均无内地浮嚣羽染，足征风气之纯。奉省现设维城学堂，专为造就宗室、觉

连振斌：《锡良与奉天的旗制变通》，《满族研究》2013 年第 3 期；陈文英：《预备立宪公会与 1910 年国会请愿运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3 期。

① Roger V. Des Forges，*Hsi-liang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连振斌：《锡良与清末新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

② 例如连振斌：《近四十年锡良研究综述》，《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戴其芳、张瑞萍：《论锡良》，《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4 期；徐建平：《总督锡良与东北边疆的开发》，《北方论丛》2001 年第 6 期；徐建平：《锡良东北经济改革方略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3 期。

③ 东三省第一任总督徐世昌曾组织一批官员学者编著了《东三省政略》，又有其公牍《退耕堂政书》流传于世，这为后世学者研究他的思想、事迹以及清末民初的事件、时事等方面的内容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

④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中华书局，1959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 3、24、32 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3 辑，大象出版社，2017 年。

⑤ 高月：《清末东北新政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 年。

⑥ 徐世昌的改革侧重于奉天一省，根据《东三省政略》统计，1908 年黑龙江全省高等学堂仅 3 所，两等学堂 20 所，初等学堂 94 所，女子学堂 7 所，共计 124 所，但到了 1911 年锡良执政期间，黑龙江省内学堂有 272 所，较徐世昌执政时期几乎翻了多倍，当时学生人数近万人，足见锡良之成绩。

⑦ 徐世昌：《拟定东三省职司官制及督抚办事要纲折》，《退耕堂政书》卷 8，文海出版社，1968 年，第 23 页。

⑧ 赵云田：《清末十年改革与革命述论》，《明清论丛》第 11 辑，故宫出版社，2011 年，第 15 页；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 1 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291 页。

罗子弟，规则颇见整齐。又三省各有满、蒙学堂，令各蒙王公、台吉一体遣送子弟就学，成绩亦有可观。”究其原因是：“从前筹设学堂，趋重高等专门，未为教育普及之计画。又因边地师资缺乏，罗致为难，故乡镇未能遍设小学”。①“近来派往北洋及京师者，虽陆续回奉，然仍不敷用。故才虽之叹，终不能免”，因此“教师乏人，而学生程度太浅”，且“奉省旧族昔日大都以门荫之故，故虽不学问亦可作官。至于平民则亦不注重学问。故至今日虽学堂林立，而学生程度则终不及内地也”。② 可见徐世昌缺少地方政府办学经验，三省内施行的教育政策不够完善，东北教育尚未普及三省各处，地方上办学质量参差不齐，出现了聘用师资素质普遍较低，教育行政机构内部人员繁冗等问题，且东北教育长期积弱，当地居民未有接受教育的意识。由此，锡良从教育行政与基础教育两方面对东三省教育进行改革。

锡良的教育行政改革包括但不限于教育机构、行政管理、学制、筹措经费、师资等，多以解释和遵循学部制定的章程，其中教育经费的筹措以及师资人才的选调与扩充，保证了基础教育在东北地区的建立与运行。③ 教育经费是东北教育体制建设的经济基础，但政府拨款及三省内的财政经费并不能满足教育普及的需要，故锡良着手从其他途径筹集经费。除向学生收取学杂费外，他还动员了东北地方宗室、觉罗、绅民等捐款、捐地，分别按捐银多寡封赏官衔，出现了“各属举办学堂，经费支绌，全赖地方绅民捐资提倡”的局面，又根据各地方不同情形从粮捐、车船捐、山货捐、护照捐、罚款等项捐税收入中筹措。④ 锡良认为“非特别优遇，变通奖励，不足以鼓舞材能，而教育之普及难望”。⑤ 针对东三省师资匮乏的局面，他先提高师资待遇，对三省学堂中供职满三年及其所教授的毕业学生已经达到六七十人的教职人员进行嘉奖，升其官职，如嘉奖奉省陆军小学校内的教授。⑥ 随后，他仿照江西巡抚冯汝骙及伯都讷厅、长春厅考成案，选拔东三省各府州县学堂的优等毕业生补充省内师资队伍及州县官职，如考拔奉天省海龙、新民、兴京、凤凰、镇安、通化、怀仁、安东、宽甸、怀德、康平、奉化、绥中各府等处学生。⑦ 通过此举，宣统元年时三省选拔出 44 名选拔生，22 名优生。⑧ 宣统三年时选拔吉林教员共 854 人⑨，选拔及资调的黑龙江教职共 639 人⑩。

针对各省教育情况差异，锡良制定了不同的基础教育改革方案。在黑龙江和吉林广设学堂，并以普及教育，启蒙民风，提高民众素质为主。相对其他二省，奉天的教育机制较为完善，因此他着力于改良教育机构，培养实业人才，扩建完善各学堂中的基础设施等事务。首先，他提出在东北建立公立、私立学校的概念，即“学堂有官立者，有公立者，有私立者。其款出自官中者为官立，省城居其多数，如法政，如方言，如农林，如师范等皆是，外属亦有官立学堂，其款则出自车捐。其款由车捐、亩捐凑合所成者，亦曰官立；专以亩捐为经费者，则为公立也。

---

① 《考察东省情形整顿内政折》，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二日，《锡良遗稿：奏稿》，第 927 页。

② 《锡良档存学务改革条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3 辑第 124 册，第 122–123 页。

③ 即“癸卯学制”颁定以来，清政府结合全国教育形势的发展和实施又制定出一系列的补充修订章程。由于修订的章程较多，此处仅举与锡良在东北的教育改革有关的章程，如 1907 年《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于 1909 年改订为《奏酌量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在黑龙江实施，吉林和黑龙江依据《改良私塾章程》公布《改良私塾布告》进而实施，另有《检定小学教员章程》《简易识字学塾章程》《酌拟优待小学教员章程》《小学经费暂定章程》等皆为锡良改革东北教育的依据。

④ 《开原昌图绅民唐树德等捐助学款地亩请奖片》，宣统元年十月二十六日，《锡良遗稿：奏稿》，第 1005 页。

⑤ 《奉省办学人员奖励并师范生义务年限拟请援案办理片》，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锡良遗稿：奏稿》，第 1300 页。

⑥ 《奉省陆军小学堂管理教授出力各员奖折》，宣统二年九月十四日，《锡良遗稿：奏稿》，第 1236 页。

⑦ 《东省海龙等府在学生员请准一体考拔折》，宣统元年五月十五日，《锡良遗稿：奏稿》，第 899 页。

⑧ 《恭报己酉科考取选拔生优生姓名折》，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四日，《锡良遗稿：奏稿》，第 1038–1041 页。

⑨ 宣统三年吉林提学使司发 854 件执照予“准充教员”，又据《吉林省档案馆全宗》卷 168 统计，1909 年时各类学校共有教员 881 名，因此其中有考核不合格者 27 人。

⑩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教育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900 页。

私立则全为私人所设立者，其数甚少”。[①] 进而鼓励私立学校的创设，当时黑龙江地区唯一的一所幼儿教育场所奎垣蒙养院便是私立性质的幼儿教育机构。[②]1909 年以后各省亦纷纷建立蒙养院，用来招收 3—7 岁幼儿，奉天省以凤城县公立蒙养院为最早。此外，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吉林省的蒙养院已经呈现出“殖民”的特点，当时已具规模的两处幼稚园分别在长春与公主岭，招收对象以旅华日侨的子女为主，兼收少数中国官僚子女。其次，锡良根据三省基础教育建设的不同状况，推进基础教育的普及。黑龙江以广建学堂为主，1910 年借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之际，设改良初等、高等私塾。“1910 年黑龙江地区 15 个府县共有改良私塾和未改良私塾，计 527 处，学生总数 8834 人。当年黑龙江地区共有 42 个……地方建制。仅调查 15 个府县，占全地区府县的 35. 7%。依此推算……全地区私塾学生数至少在 2 万人以上。私塾学生数远超过官学学生数。”[③] 同时又根据《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设女子小学堂。1911 年前后齐齐哈尔、宾州府、双城等地陆续建立了新式中学堂。吉林则以创建特色学堂为主，如创建满蒙文两等小学堂、半日半夜学堂、改良私塾以及女子学堂。“宣统元年，吉林省学务统计，全省有高等小学堂 10 所，两等小学堂 23 所，初等小学堂 201 所，半日学堂 3 所，共计 237 所，其中女子学堂 4 所。以办学经费来源不同，又分官立、公立、私立 3 种。官立学堂 153 所，占 64. 55%；公立学堂 79 所，占 33. 33%；私立学堂 5 所，占 2. 10%……至宣统三年上半年，在预备立宪运动的推行下，新增加小学堂 126 所，女子小学堂由原来 4 所增加到 9 所。”[④] 奉天则对学堂进行扩建，进而扩招受育群体，如扩建维城小学校的教学楼、宿舍、食堂与浴池等场所。[⑤] 又根据《增订各学堂管理通则》约束了省内各学堂学生品行、考验、操场、斋章、赏罚等，用以加强对学生思想行为的管训。再次，锡良鼓励各省建立民族学校，编译民族语言教科书。其中影响最广的应属满蒙文教科书的编译与发行，宣统元年七月，他令精通满蒙文字的荣德编译教科书，“先将学部审定之初等小学堂各种教科书择其紧要当用者译成满蒙两种文字，挑选写生缮成满蒙汉三文合璧，装订成册。 ”[⑥] 宣统二年二月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与劝学文石印出版，共 25000 册，主要刊行于奉天的蒙文学堂、满蒙文中学堂、维城小学堂、蒙古小学堂、汉军小学堂，此教科书后又在吉林与黑龙江的满蒙文中学堂发放，同时还发往土谢图等蒙古地区的学堂。[⑦] 至宣统二年四月三省“学生教材尚不缺乏”。[⑧] 与此同时，其他民族语言的教材也相继编撰，如编写《朝鲜语》供我国朝鲜族及朝鲜难民[⑨] 使用。除建设满蒙族的学堂外，黑龙江还有赫哲族苏苏屯小学堂、鄂伦春比拉尔路小学堂、莫力屯达斡尔初等小学堂等。吉林有通化清真小学堂、长春府清真初等小学堂等，这些学堂还加授伊斯兰文。最后，他倡导了一系列实业教育的建设与改良。1911 年于黑龙江呼兰、海伦、瑷珲等地建立了初等农业学堂、初等工业学堂和初等商业学堂。随后又根据《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设立女子师范学堂及其附属小学。1910 年吉林省创办初等工业小学堂及商业小学堂、工业预科学堂、农业预科学堂。自 1909 年至 1911 年，吉林“全省共有

---

① 《锡良档存学务改革条例》,《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3 辑第 124 册，第 123-124 页。
② 该园为 1911 年由黑龙江行省公署提学使司总务科科长林传甲之母刘壿创办。
③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 · 教育志》，第 104 页。
④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 · 教育志》卷 37，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41 页。
⑤ 《扩充维城小学校额折》，宣统元年十月二十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第 1000 页。
⑥ 《内蒙古教育志》编委会编:《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第 2 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74 页。
⑦ 在吉林省者，如文庙蒙文学堂、忠王庙蒙语学堂、东莱门满蒙中学堂、巴尔虎门蒙满两等；在黑龙江省者，如黑龙江满蒙师范学堂，同时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也学习蒙文与满文。
⑧ 《锡良复学部电》，宣统二年四月初二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3 辑第 61 册，第 82 页。
⑨ 《朝鲜语》教材为 1909 年延吉道局子街垦民教育会聘请桂奉禹、尹河洙等学者编纂，供延吉道各地私立朝鲜族学校使用；使用《朝鲜语》的学堂有吉林延边地区的垦民学堂、垦民师范学堂，以及黑龙江宁古塔、穆棱、海林、密山、饶河、五常、阿城、哈尔滨等地私塾、小学堂、新式中学堂等。

各类实业学堂 13 所”。[①] 同时，他在奉天则增设教育机构，如筹建以刑事诉讼为专科的学习所，“以高等检查长监督其事，额定学生一百名，延聘专员教授，以一年半为毕业之期，毕业后照章给予出身，分厅任使”。[②] 又改良刑法政令，完善司法中的刑事与民事法律，至 1911 年学习所甲乙丙三班毕业者共有 192 名。[③] 法政检验学习所于宣统三年三月十二日改为高等检验学堂。[④] 锡良又建设矿务学堂以兴奉天矿业，并向学部求取矿物人才。[⑤] 他还改良了奉天学堂的军事课程内容，将兵式体操改为学习兵学战术和枪剑术，如是等等。[⑥]

三、锡良在东北教育改革的评述

锡良在东北的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教育改革在东三省实践的第二阶段，改革凡涉及设立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兴建各级新式学堂、设置学制、使用教育经费、管理师资队伍等问题时，基本遵循“癸卯学制”及其补充章程的规定，锡良在其基础上根据东三省的地方特色调整改革举措。

锡良以满蒙官吏立场实行的教育改革，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清王朝在东北地区的教育主权，但因时局所限，改革未能摆脱封建制度的弊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改革未能摆脱封建教育的性质。因社会性质的影响，进入学堂学习的群体，仍以宗室、觉罗、绅民为主，他们毕业后或受实官奖励或捐学款，获得任地方官职及管理地方的资格等，因而封建科举制遗留下的社会现象仍旧存在。其次，东北受强邻环伺多年，清政府始终未能阻止日俄“殖民”东北的步伐，东北出现了“殖民”教育危机。吉林出现了日本“殖民”教育学堂，黑龙江出现了沙俄“殖民”教育学堂。例如，1911 年创办的哈尔滨俄侨第一齿科医学校只招收俄国学生，这种现象至 1933 年（民国二十二年）以后才被打破，学校开始招收中国学生，但仍旧以招收俄国学生为主，且教师全部为俄罗斯人。最后，改革目的是培养新式人才以进行“学战”，却又造成了东北人才的大量流失。宣统元年学部急需经学、史学、语言学、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人才，而东北地处边陲，且支银难以维持学务花销，三省内尚未有可举荐的学生，但宣统三年二月初三日的电报中记载有“奉省优级师范数理化选科最优等毕业生十三名应送京复试”，这表明锡良在短短的 2 年时间里培养出了学部所需的人才。[⑦] 这种情况间接引起了东北人才南流，如毕业之后投效四川、贵州法政学堂的毕业生占 20%。[⑧]

锡良的教育改革对徐世昌的教育改革进行了弥补，如考拔海龙府等属的 13 名毕业生的举措，是徐世昌咨商礼部请拔后未完成的考拔事宜。锡良接手徐世昌未尽的教育改革后，保证了各学堂教学培养的周期，以及结业学生的学习质量与运用知识的能力。相对于徐世昌在奉天广兴学堂，锡良更注重在奉天省有针对性地建扩法政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和军事学堂等。不仅如此，他又在黑龙江与吉林广设劝学所，用来督促地方学堂建设，做到了东北各省基础教育的普及。这使得东北新政教育改革更加完善，且有针对性地面向近代社会，为当时东北政法、工

---

①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教育志》卷 37，第 202 页。

② 《筹设检验学习所折》，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锡良遗稿：奏稿》，第 956 页。

③ 《锡良复学部电》，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3 辑第 61 册，第 473 页。

④ 《检验学习所改办高等检验学堂片》，宣统三年三月十二日，《锡良遗稿：奏稿》，第 1293 页。

⑤ 《锡良致学务电》，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三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3 辑第 60 册，第 564 页。

⑥ 《奉省中学以上各校改练打靶体操折》，宣统二年十一月三十日，《锡良遗稿：奏稿》，第 1261 页。

⑦ 《锡良收外部学部来电》，宣统元年六月二十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3 辑第 60 册，第 198-199 页；《锡良致学部电》，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3 辑第 61 册，第 511 页；《锡良致学部电》，宣统三年二月初三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3 辑第 62 册，第 92 页。

⑧ 《奉省法政学堂第一次甲乙班毕业学员练习期满遵章请奖折》，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锡良遗稿：奏稿》，第 1200 页。

业、商业、农业、军事等方面提供可用人才，培养了东北地区后继师资队伍。

锡良在东北任职时期的教育改革颇具个人特色，即改革所用时间短，执行效率高，涵盖社会面广，为东北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一，他的改革教化了三省民风，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安全。日俄为侵略东三省，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为侵略殖民的工具进行研习。因而，锡良创设与普及民族教育的举措对培养精通民族语言的人才、普及民族语言在东北的运用、加深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与认同、维护清王朝对东北少数民族的管理以及近代东北人民的反殖民反侵略斗争都具有积极意义。1910 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大批朝鲜移民涌入我国东北，或出于政治因素，或出于维护社会秩序，朝鲜族教育机构在东北创建。朝鲜族改良私塾的设置加强了朝鲜族与东北其他各民族之间的联系，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前，这种具有移民性质的教育机制仍然存在。其二，他将近代教育机制普及到东北，进而动摇了封建教育的根基，为东北近代革命思想发展提供了契机。在锡良遗留的档案中有这样三件电报，即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省城中学以上学生间有托敌情假私入各界……赴各处宣讲者，锦州中学及营口商业学堂学生……”，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学生有被人诱惑，敢于干涉政事或教员等暗中鼓动等情”，宣统二年十二月学部决定将“已将辫发剪去者，殊属违制……不留发或再私行剪发者，应由学堂立即斥退”。[①] 电报内容涉及东北学生参与革命宣传与剪发，展现了其自主的革命意识。即使此种情形并非遵循锡良教育改革的初衷，但结合其广兴农工商学堂及女学的举措，他的改革使东北师生接触到了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进而壮大了近代东北知识分子及革命群体。[②]1910 年东北人民在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中学堂建立了同盟会黑龙江支部，随后省内各师范、政法、工业、农业、陆军等学堂内的师生纷纷加入其中。1911 年，当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东北，黑龙江爆发了以学生群体为主的独立游行运动，吉林、奉天各学堂学生以罢课、退学进行斗争，促进了辛亥革命在东北地区的开展，传播了近代社会文化理念。

---

① 《锡良复学部来电》，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3 辑第 61 册，第 503、509、549 页。

② 《创设八旗女工传习所请立案片》，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四日，《锡良遗稿：奏稿》，第 1045 页。